



党的老前辈领导人如何处理群众来信

冯兵 赵一

群众来信是联系党与人民的重要纽带，是民情民意达至国家不可或缺渠道。重视群众来信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时至今日，群众来信处理仍是党和国家所应重视的问题。

群众来信无小事

群众来信所反映的困难往往是基层人民生活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积少成多，就会动摇民心。毛泽东深谙这一道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党政大事繁杂，但毛泽东却坚持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无论信件是否署名，无论来信的是文艺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他都会亲自阅读信件并及时作出回复或交有关部门处理。

上海工人金祥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上海物价飞涨，工人们难以养家糊口。来信除了讲述现状，还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两点建议。毛泽东读信之后，立刻将此信转交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李先念处理，并嘱其事汇报。1953年，毛泽东收到沈钧儒反映血吸虫病流行的信件后，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他多次派人前往灾区调查研究，最终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

周恩来也非常重视群众来信。山东省广饶县公安局一位名叫曹树立的干部，1961年10月，家庭变故频仍，绝望之余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惠民、广饶两地群众多有患病去世的情况，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周恩来深感问题严重，即刻给山东省委书记谭震龙去信，希望马上调查了解两地实际情况并予以救助。山东省委根据惠民、广饶的实际情况，紧急拨付救灾资金，调运救灾物资，两地灾情有所好转。

习仲勋曾有感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一贯重视人民的来信，对于其中涉及的事情也都尽可能地予以解决。1954年底，习仲勋收到一份关于西北地区物资供应紧张、供应结构不合理的信件，感到事关重大，随即让秘书起草一份报告交由毛泽东阅示，当看到秘书由于信中实例稍显粗俗而在报告中未提及及时，习仲勋说，例子虽欠妥，但却最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问题和现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报告递交后，立即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批示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处理来信须及时

对于群众来信来访，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尽量及时处理，以保证群众声音早听见，群众事情早解决。胡耀邦就曾坚持每天阅读一两封群众来信，并强调对于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无论开会之余还是出

访途中，只要一有闲暇，就会看一看群众来信。

毛泽东是及时处理群众来信的典范。1950年5月上旬的10天时间里，毛泽东回复群众来信近80封，最多的一天回复18封。1951年10月8日，中办秘书室收到一封关于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反映厂内工资拖欠，严重影响工人日常生活，致使工人们不堪其苦，生产受到影响的信件。12日，毛泽东亲自回信，从接收到处理仅用了5天。1975年8月15日，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写信反映一些地区食盐价格高昂，影响群众生计。毛泽东见信后当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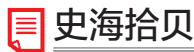
周恩来非常重视及时回复群众来信。“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顺利归国，即有赖于周恩来及时的悉心安排。1955年6月，在收到钱学森在家书中夹带的关于志愿归国的亲笔信后，周恩来即开始安排逐项事宜，在随后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会谈中，为钱学森回归祖国扫清了重重障碍。周恩来不但重视处理来信的时效，更注重鼓励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多来信，多与党和国家交流在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期达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效果。1958年，周恩来在成都参加会议，其间他参观了位于成都郊区的友谊农业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日之后，周恩来收到了沈志均寄送的参观时的影像集，连夜回信希望能够每月都收到关于友谊社的生产情况。沈志均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按时向总理反映社里的情况。

处理来信制度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群众来信愈加成为党和国家与人民联系沟通的桥梁。群众来信数量的增多，涵盖范围的扩大，使得信访制度化成为必然的趋势。群众来信数量激增，日常信件处理流程已很难满足现实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注重信访机构的专业性和信访的制度化建设。刘少奇建议毛泽东将群众来信编辑一个内容摘要，以提升信件办理的效率。1949年成立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是中央处理群众来信的第一个机构。1951年，为了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能够更方便直接地阅示群众来信，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应运而生。该部门设立后成效显著，群众来信数量从1月份的468封增至同年3月的11436封。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作出批示，“必须重视与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并强调要坚决杜绝“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到了1953年，政务院秘书厅群众信访组成立，成为一个规范的专门处理信访工作的常设机构。

1951年5月，毛泽东针对中央办公厅关于群众来信的报告，作出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五月批示”，明确了信访作为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重要措施的地位，并提出了设置专门信访机构的构想，成为信访工作制度化的起点。同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标志信访制度开始确立。《决定》篇幅很短，仅有6条内容，明确信访工作机构的秘书性质而非权力机构。1957年5月，国务院相继颁布《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政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草案）》。随着系列试行办法的出台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处理群众来信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正如邓小平所言：“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让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如果那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显然，群众来信不仅是民情民心的风向标，更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障。



王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在罢官受审近20年后，他重返政治舞台，回到公众视野。

走马上任之际，黄克诚请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黄克诚对此非常赞同，认为“党风搞好了，党就有希望”。他强调工作人员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纪检干部要像保健护士，自己要身体健康，不能自己带着病、带着很多细菌来做保健工作！”

黄克诚一向清正廉洁，在抓党风问题上，更是强调正人先正己。这个正己，包括对自己、对家属、对身边工作人员、对部下，就是要保证自己“健康”。

是一套房子重要，还是抓党风重要？”

中央纪委成立后，很快颁布了一系列党规党纪。其中《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针对党内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贪污腐败、生活特殊、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的现象而制定的具体规定，共十项，意在敲响警钟，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

《规定》颁布之日，黄克诚就对妻子唐棣华说：“中央纪委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公家提供的住房。有了规定，我们总要带头按规定办。现在公家给我安排了住房，你单位以前分给你的宿舍就要归还给单位。”

唐棣华问：“你是说乾面胡同的那套单元房？”

黄克诚被罢官后，唐棣华也跟着挨批判。她精神上受了刺激，有一阵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适逢单位分房，按她的级别在乾面胡同分给她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房，她就和黄晴、母亲等人搬到了乾面胡同住，只在周末回大水车胡同4号院。黄克诚外放山西后，大水车胡同4号院就腾退了，唐棣华率全家人都挤住在这套单元房。这套住房虽小，却为唐棣华和子女们遮风避雨，使他们度过了最难忘的岁月，现在要归还，从情感上真有些舍不得。

“舍不得也要舍！你也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参加了工作的老干部，既然中央纪委有了规定，不管别人执行得如何，黄克诚家要带头。是一套房子重要，还是抓党风重要？”黄克诚说。

唐棣华连忙说：“我明白了，我明

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需把握的几个问题

赵迎辉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对于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懈怠心理和“为官不为”现象，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改革创新、支持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认识上的模糊不清以及制度上的衔接不够，导致实践中容错纠错机制并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澄清这些模糊认识，把握执行中的关键问题，是贯彻落实实意见精神，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基本前提。

科学界定容错纠错之“错”的内涵。科学界定干部容错纠错之“错”的内涵是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首要条件。作为政治领域新生的话语体系，现有的党规和国法都未对容错纠错之“错”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理论界也缺乏统一认识，导致实践中人们对于容错纠错的理解存在歧义。有些干部甚至对

黄克诚抓党风：正人先正己

核心阅读

“党风搞好了，党就有希望”。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工作的7年中，以虚弱的身体，在迟暮之年，掀起一面抓党风肃纪律的大旗，将已近黄昏的生命，燃烧成灿烂辉煌的晚霞，映红岁月，奏出一曲不辱使命、绝对忠诚的人生华章！

天就去办交房手续！”

黄克诚知道妻子对那套宿舍充满了感情与回忆，但正人先正己的话，不能只挂在嘴巴上。他强调说：“谢谢你理解我，支持我。你是黄克诚的妻子，从严治党，治家是其中的一部分。高级干部必须从严治家。抓党风是要落到实处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实处就是生活上不要和人比，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

“一定要查！我的部下那更要查！”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干，同时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这顿饭共花去400元，结账时，杨勇以总参的名义开了一张400元的发票。几天后，这件事被举报到中央纪委。黄克诚知道后恼火地说：“这种做法是违反《规定》的，这件事要查一下！”秘书小心地提醒他，现在公款吃喝比较普遍，光查这事不妥。再说杨勇、张震都是他的老部下。

黄克诚态度十分坚决：“一顿饭吃掉400元，一个农民一年能挣几个钱！我们吃的、喝的，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创造出来的。一定要查！我的部下那更要查！要查，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其他公款吃喝的，发现一个也查处一个。”

杨勇、张震和黄克诚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开始，杨勇认为是小题大做。不少人也前来为杨勇说情，张震等参与饭局的人也请求共同承担责任，饭钱他们大家来分担，小事情低调处理一下算了。

黄克诚思考得却很深刻。党内所出现的不正之风，与许多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有直接关系，这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的地方。只有党的高级干部廉洁自律，才能形成良好的党风。作风无小事，件件都是关系到党风问题的大事。他给杨勇打电话，批评

道：“杨勇，你官当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杨勇放下电话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公款吃饭的事我错了，我作检讨！您也不用查了，是我出的主意。这顿饭钱我自己出。”

“杨勇啊，你不要以为交上这个钱就心安理得了。请总参几位领导吃顿饭说起来事情不算大，但中央有规定，发了文件，领导就要带头执行。这不是400元钱的小事！是党的高级干部工作、生活作风的大事！高级干部不带头，刚制定的《规定》不成了放空炮？党风何时能好转？！在端正党风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不然怎么服众？”黄克诚语重心长地说。

杨勇深感震撼，也彻底意识到这不是400元钱的问题。第二天，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还主动在总参发了通报。

“在抓党风问题上要有赤子胸怀，更要有铁石心肠。”

“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立之前，中央纪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已临时设立了第二办公室，对外称“中央纪委二办”，专门承接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历史事件的清查和审理工作，包括审理“两案”工作。“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立后，“中央纪委二办”就成为领导小组的下设“两案”审理办公室，对外仍称“中央纪委二办”，曹广化担任第一主任。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有同志提议，“二办”有许多从军队抽调来的同志，应该按军队的习惯搞个会餐。曹广化同意会餐，让下面筹办一下。

黄克诚听说后，叫来曹广化板着脸问：“会餐花的是公家的钱吧？”

曹广化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道：“黄老，这个事是我考虑欠周到，当时只想到大家辛苦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会个餐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上升到事关党风党纪的高度看问题……”黄克诚见曹广化不仅没有狡辩，

而是主动检讨，心里的气减了不少，面上的表情缓和了：“广化啊，我们中央纪委天天说要抓党风，自己却用公款大吃大喝，这怎么带头抓党风？你是中央纪委常委、二办主任，又分管机关事务，不请示，不讨论，自己做这个主，是错误的。党风好转是一件小事体现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

曹广化连忙应道：“黄老，您说得对，我就回去写检讨，在全机关作检讨！”

曹广化是认真的。黄克诚所经历的坎坷，比很多人要多要重，可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从国家大局着想，襟怀坦荡，这样的品格，又有几人能和他比？他突然理解了当初中央为什么坚持让一个眼睛都看不见的老人出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之职，黄克诚的品格风范，就是党风的一个标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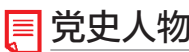
曹广化一返回办公室，立即取消了会餐计划，并就会餐之事作深刻检讨。

“我去玉泉山，也得约法三章。”

黄克诚复出后，因身体虚弱，部下和熟人纷纷劝他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他却担心劳师动众，坚决不去南方休养。他说：“我一出去，就要带一帮人陪护，那要花公家多少钱！还要给地方添很大麻烦，去不得，不能去！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去就是浪费。即使浪费掉一分钱，也愧对老百姓。”

事情不知怎么反映到中央领导那里了。中央很重视黄克诚的健康，陈云等领导同志指示中办，要他就近到玉泉山去休养一段时间。陈云动员他说，玉泉山环境安静，既有利于康复，又可兼顾工作。黄克诚这才答应，但又提出，他去玉泉山，也得约法三章：一、只带一个秘书，不带家属和其他随员；二、家属除星期日以外，不要去看我；三、一切生活费用自理，不要公家补助。陈云同意后，他才住进了玉泉山五号院，一边养病，一边工作。

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工作的7年中，以虚弱的身体，在迟暮之年，掀起一面抓党风肃纪律的大旗，将已近黄昏的生命，燃烧成灿烂辉煌的晚霞，映红岁月，奏出一曲不辱使命、绝对忠诚的人生华章！



错纠错机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准确把握执纪问责和容错免责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执纪问责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执纪问责要求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容错纠错要求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无论是问责制度还是容错机制，本质上都是提高权力运行效能的制度措施。问责是从防止权力出错的角度保证权力运行效能，而容错则是从鼓励权力创新的角度提高权力运行效能。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衔接，成为落实容错纠错机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加强纪检部门和组织部门之间的沟通会商。执纪问责是纪检部门的职责，容错纠错主要由组织部门牵头，两个部门应当建立定期沟通会商机制，对可能符合容错纠错情形的案例进行综合分析，共同商定是否予以容错免责。通过部门之间的沟通会商，不仅可以实现执纪问责和容错纠错之间的权力制衡，而且可以防止执纪问责和容错纠错相互脱节导致的制度悖论，从而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与激励干事创业的协同共赢。

